

中华民国文化史 中

主 编 史全生
副主编 王春南

曹 娥

蒋顺兴

吉林文史出版社

K258.03

1

✓

中华民国文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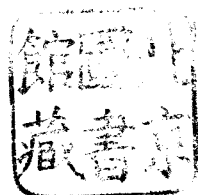
(中册)

主 编

史 全 生

副主编

王春南 曹 峨 蒋顺兴



吉林文史出版社



693331

第 二 编

民国文化的艰难发展 (1927—1937)

第 二 编

民国文化的艰难发展 (1927—1937)

第一章 三民主义的命运和 新民主主义的创立

第一节 孙中山逝世后的三民主义

一、国民党对三民主义的种种解释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元老”邹鲁、谢持、居正、林森、覃振、石瑛、戴季陶、叶楚傖、邵元冲等结成的西山会议派，在理论上主要是强调所谓“民族主义”和复兴“王道之文化”。他们指出，孙中山逝世后，“民族间之生存竞争”是“至今犹为不可避免之事实”，“凡被征服之弱小民族，则民权永无振兴之日，而民生亦必日即于穷蹙”。^①于是，他们把民族主义提到了最主要的位置上，认为占世界“人类四分之一人口而赋有王道之文化者，惟我中华民族耳”。但可惜的是“我中华民族亦有遗忘其固有之文化，不知民族主义为何物者”，使“国民革命遂受重大之打击矣”。^②他们攻击矛头主要是指向中国共产党。他们诬蔑共产党人“盲目模仿苏俄”，视中国文化如敝屣”。^③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事事效忠于苏俄”，“成为外国支配中国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在为“清共”制造理论根据。

^{①②③}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4月8日，《清党实录》。

他们背弃新三民主义的联共政策，决议取消和开除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和领导职务。此外，对国民党左派和所谓反共不力的中间派也作了攻击。他们“变更”新三民主义的联俄政策，攻击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还说什么列宁废除沙俄时期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是“危机之秋”的权宜之计。^①他们歪曲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学说。扬言共产党若不放弃阶级斗争主张，“吾人”“势必截断其主张”。^②可见，西山会议派虽然打着“奉总理手创之三民主义”的旗号，但是说穿了只不过是为其反共理论作一些点缀罢了。

继西山会议派之后，戴季陶也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提出了新的解释。戴季陶（1890—1949），国民党右派理论家。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曾留学日本，后参加同盟会。

“五·四”时期创办《星期评论》。1920年曾参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筹备活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长等。孙中山逝世后，他以“纯粹”三民主义自居，“完全抽去了孙中山学说中的一切革命的东西”，发展了其消极方面，形成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成为后来蒋介石集团反共反革命的理论基础。他的思想主要有：

第一，鼓吹以封建“道统说”为基础的所谓“纯正的三民主义”。戴季陶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是以中国固有的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思想为基础”的。^③

①②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4月8日，《清党实录》。

③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孙文主义讨论集》1927年3月版。

其基本点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儒家的“中庸之道”。他说，孙中山的全部思想，可用“天下之达道三：民族也、民权也、民生也”概括。^①集中起来讲就是“智”、“仁”、“勇”三个字，而统一这许多事实和思想的中心是“以一诚贯知”。^②戴季陶还指出，把“古代孔子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拿来应用，真正做到，这才是“孙中山思想最根本的一点”。按照这种说法，三民主义实际上成了封建复古主义。他还把新三民主义仅仅看成是“文化复兴”。他说孙中山“所创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复兴文化为基础的”。这仍旧是在重复对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的曲解。因此，在他的“解释”里，所看到的只是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缺陷和错误的歪曲和夸大，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却被扼杀殆尽。

第二，宣扬以“仁爱”为基础的所谓民生主义历史观。戴季陶把“民生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本体”，认为“三民主义并不是三个部分，就本体上看只有一个民生主义，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③借此推销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封建“仁爱”观的一套理论。他说：“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即民生哲学之基础”，^④孙中山的思想、“信仰”、“力量”都是由爱中国而生。因此，革命“是从仁爱的道德律产生出来，并不是从阶级道德律产生出来的”，这个仁爱亦“人道主义”。“国民革命”“是联合

① 《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1959年3月出版。

②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1925年6月，《孙文主义讨论集》1927年3月版。

③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

④ 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的说明》1925年5月19日。

各阶级的革命”，一方面是要治者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为被治者阶级（包括工人阶级）的利益来革命；另一方面，要被治者阶级也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革命。这是因为，“仁爱是人类的天性”，“阶级差别，并不是绝对能消灭人类的仁爱性”，“爱人利他的仁心，更不是一定要同阶级才能够具备”。并认为，中国社会“没有明显的强大的阶级区分”，只有孙中山所讲的“大贫与小贫”的区别。^①为此，他号召各阶级的人“抛弃阶级性，恢复国民性，抛弃兽性，恢复人性”，以此来反对以阶级斗争的形式去反抗压迫者，而要以“仁爱之心”去感动压迫者。同时虚伪地表示，希望统治者觉悟，对被统治阶级也实行“仁爱”。这实质上是企图用阶级调和的理论来代替阶级斗争学说，进而达到从根本上取消中国革命的目的。

基于上述解释，戴季陶提出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的团体“排他性”、“独占性”和改造国民党的理论。他反对孙中山提出的国民党要注入“新血液”的主张，说什么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能把他们作为正菜”。他认为国民党“若失却独立地位与组织之中心，必招他日无穷的纷扰”。^②他制造了团体有“排他性”和“共信不立”的学说，认为这是由人类生存欲望决定的。“因为要独占，所以要排他，因为要统一，所以要支配”。他攻击共产党员是国民党身上的“癌肿”，是“齐天大圣对牛魔王的策略”。他幻想如二次革命那样，重新建立一个“纯粹之国民党”，^③主张“由国

① 戴季陶：《革命知识与革命工作》，《戴季陶言行录》第484页。

② 陈天锡：《增订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

③ 《戴季陶先生文存》第982页，台北1959年3月版。

民党忠实的领袖”，拼命行一种迪克推多（dictator 的音译，即独裁者，此处作独裁主义讲），建设起国民党的纪纲来，然后“再说组织和纪律的话”。

戴季陶主义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是反对新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是“愚弄农工阶级的政策”。

二、第三党与蒋介石的政治思想分歧

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左翼政党，^①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民主党派。其发起领导人是民主革命家、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它的正式名称几经变换。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由宋庆龄、邓演达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告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在国内，积极响应邓演达等号召的国民党左派和从中国共产党中游移出来的部分人士，于翌年初在上海召开“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大会。选举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朱蕴山、李世璋、马哲民、郑太朴、季方、黄慕颜、邓初民、张申府、王枕心等为主要负责人。该党1947年1月更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以《革命行动》等刊物为阵地，广泛进行反蒋宣传。先后在全国十多个省和许多大城市（包括香港）建立了组织，并确定要“造成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

^①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67页。

命军”。①为此，邓演达于1930年秘密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志会”，策动国民革命军陈铭枢、陈诚、邵子举、杨虎城以及冯玉祥、阎锡山、张轸、高桂滋、卢兴邦、刘湘、邓锡侯、郭汝栋、孙震等部，直接开展了倒蒋军事行动。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牺牲，第三党遭受重大挫折，但许多成员仍然继续坚持斗争，并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一支重要进步力量。他们的主要思想主张有如下数端：

（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与反蒋主张。

第三党明确指出，现时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势力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半独立的”封建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从“较远的将来的前程”来说，肯定“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从“现阶段的前程”而言，则是反帝反封建的平民革命。只有这样，才能“恢复被叛徒们中断”的“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②这一认识与中共的主张是比较接近的。第三党还认为，反帝反封建就必须反蒋，“使用武力斗争”，③推翻南京政权。这是因为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实行“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较之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至于第三党的反蒋与汪精卫的反蒋有何质的区别，他们是这么说的：改组派“只是反蒋而不反南京的统治，所以结果至多是取蒋而代之”，或去一蒋而产出更多的蒋介石。④

①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军事运动方针》，1930年8月，《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②④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

③ 章伯钧：《我们最近的政治主张》，中国革命问题研究会印制，1932年11月10日。

第三党反蒋旗帜是十分鲜明的，其反帝反封建反蒋的政治主张，在许多方面与中共的最低纲领有相似之处，这反映出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革命性。

（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各阶级政治状况的分析。

第三党否认了中国革命性质的资本主义前途，并看到了现阶段尚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不承认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的民主革命，回避了客观存在的革命性质问题，把自己视作“继承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革命不屈精神，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新集团”。^①而实际上，他们领导的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在中国历史已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仍打算由小资产阶级政党来领导革命，并建立“平民政权”，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不现实的。

在社会各阶级分析上，第三党成立之初时认为资产阶级与军阀、官僚、地主已熔于“一炉”，“已经是革命对象”。^②但时隔不久，邓演达遂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从革命对象中划分出来，^③这是其思想主张上的一个进步。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重要作用，但却又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自树一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④他们认为中国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并把自己称作是“农民本身的政党”。^⑤他们提出了一个由工、农、手工业者、小商、学生组成的“劳动平民阶级”的概念，试图把分属于不同阶级

① 《中华革命党对时局宣言》，1929年3月。

②④⑤ 《中华革命党宣言草案》，1928年6月。

③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

（虽然都属于劳动阶级中的人们）糅合为一个阶级。这种理论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

第三党对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许多正确的分析。他们说：西山会议派是“本党的叛徒”，“是封建阶级的代表”；南京政权和国民党中央“假谈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是封建、买办军事独裁的集团；改组派是“部分失意政客军人的政治投机集团”，虽然其“下层群众不乏革命分子”，但他们“改组实在只是改换主人，去组织联合的反动政权”。^①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他们承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表示“愿与之合作”。但对当时的第三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是指责的，提出了打倒“工具主义”和“消灭”“共产党势力”^②的错误口号。当然这与当时共产党内部“左”倾错误占上风，拒绝同邓演达“合作反对蒋介石”，以及第三党本身“理论认识不足”^③有很大关系。

第三党主张通过“平民革命”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并进而通过平民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对“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劳动平民的民生主义”，简言之，就是废止私有财产，将生产资料“均归国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在农村，应分两步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步实现“耕者有其田”；第二步耕地国有，最后实现社会主义。不可否认，第三党的平民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主张中确有不少可供借鉴的有益见解，也正是由于其理论上

①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告第一号》，1930年8月10日。

②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宣言》，1930年9月15日，《行动之声》1932年版。

③ 《本党彭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农工民主党参考资料》。

的进步，才使得第三党逐步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正确道路。

三、改组派与蒋介石政治思想的异同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是1928年——1931年这一时间内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主要由汪精卫派为与蒋介石派争权攘利而组织起来。改组派于1928年春夏之间在上海成立，主要成员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也有一些衷心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如王乐平等；其中有的后来还成为民主党派的重要领导，如郭春涛等。改组派的中下层分子中包括了一批政府机关职员、军警、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在苏、浙、皖、冀、鲁、晋、豫、赣、鄂、湘、川、粤等省以及香港、日本、越南、新加坡、法国等地建立了各级分支组织，形成了声势颇大的改良主义运动。

改组派在“恢复（民国）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总口号下，反对所谓“腐化势力”和蒋介石集团的统治。

他们以国民党左派自居，宣称：“北伐胜利后，党中腐化分子及投机分子”，“抛弃本党主义”，吸引“反动势力”，“政治集于官僚”，“与军阀时代毫无不同”。^①这里所指的腐化分子就是国民党中的无政府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加入南京政权的一些北洋军阀政客。他们认为这些人使国民党内充满了“左倾、右倾、腐倾、恶倾”。并说：“今日

① 《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1929年3月31日。

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再不见三民主义的实行”。^①他们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也持“改组”态度。认为“蒋介石践踏了民主精神，挂了国民党招牌”，干的是“迪克推多宰割全国”的勾当。

改组派所谓“十三年改组精神”，并不是指孙中山确定三大政策后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也不是指改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革命精神。第一，他们不承认国民党有过联共主张，说什么只有“容共”而无“联共”，三大政策只是共产党在1926年10月创造出来的。^②第二，他们不否认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有“联俄”精神，但却攻击第三国际已“是另一个支配中国的反动势力”。第三，他们认为扶助农工是“十三年改组的第一个精神”，故提出所谓“深入农工群众”的口号，并把扶助农工说成是“本党三民主义的大道”。^③然而实际上，自“七·一五”政变后，改组派镇压工农群众运动与蒋介石集团没有两样，这个口号只是他们所谓改组的一块招牌而已。总之，改组派“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蒋介石集团的“恢复国民党‘一大’精神”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以否定国民党“一大”的三大政策为前提的。

改组派自称是坚持了“三民主义的革命”。他们说，三民主义是“中国此时客观环境的绝对需要”，并认为蒋介石派已把“革命的三民主义变成了复古的封建主义”，^④“再

①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1928年5月7日。

② 陈公博：《再论第三党》，《革命评论》第8期。

③ 陈公博：《五个问题的讨论》，《革命评论》第4期，1928年6月出版。

④ 《汪精卫等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1929年3月11日。

不见三民主义的实行”。这一认识可以说是切中了蒋介石派所谓三民主义的要害。然而事实证明，改组派和蒋介石派无论在具体主张上有多少差别，但根本上都是排斥三大政策的，因此，都是假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

改组派还提出：改组国民党就要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他们说在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一天更腐化一天”，“整个党早已破碎不堪”，只看见“几个互相矛盾的封建的军事集团”。为此，他们主张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以党治军”，“以党治国”，取消形式上低于中央党部的“政治分会”，①以“非常会议”或“扩大会议”一类平起平坐的机构与蒋介石所控制的任何名义的中央争斗。实际上改组派的“以党治军”是要求各派军阀听从汪精卫的“党”的指挥。他们的“以党治国”是要反对其他党派的存在，包括第三党的存在，②实行汪记国民党的专政。可以说，在一党主义问题上汪精卫与蒋介石是相同的，都主张除国民党以外，其他党派必须一律消灭。

改组派坚持反对中国共产党，他们指出对于共产党“本党皆应努力扫除之”。③这与蒋介石派的反共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表面看来，蒋介石指责改组派“反共不积极”，改组派则攻击蒋介石是“消极的反共”，事实上这两派都在反对“共产党问题上进行着热闹的大竞赛”。

① 公孙愈之：《我们对于第五次会议最小限度的要求》，《前进》第1卷第3号，1928年7月1日。

②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革命评论》第10期，1928年7月8日出版。

③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9年2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6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四、胡汉民晚年的政治思想

胡汉民（1879—1936），字展堂，国民党著名理论家和领袖。曾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九·一八”事变后，因与蒋介石政见不一而远避香港，并在西南组织过“新国民党”（胡在组党时，仍称“中国国民党”，并以正统自居，“新国民党”只是当时流行的称号）。

胡汉民是一个以旧三民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日本的入侵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以及胡汉民个人政治地位的变化，胡晚年思想主张与其前期有所不同，在某些方面甚至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胡汉民坚持旧三民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他所言的三民主义其基本内核始终是旧三民主义。他极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孙中山逝世后，他以“最有资格诠释国父思想”的理论权威自居，①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小环”折合成“大连环”的所谓“连环性”来解释三民主义，②声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缺一不可。但在实际运用时，他“从来只注重一个需要”，③也就是以其个人的政治需要作为取舍标准的。为通过“党治”来完成“法治”，再过渡到“民治”，他坚持由国民党充当“政权保姆”以及实行“训

① 《研读胡先生言论著述的一点心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36页。

② 参见胡汉民：《三民主义之认识》，第5页。黄埔出版社编印，1929年11月版。

③ 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79页。

政”的观点。1931年2月他被囚汤山，上述主张受挫。

“九·一八”事变后，他提出了新的政见，除继续坚持反共外，还表明了抗日和倒蒋的主张。他始终认为，孙中山三民主义“没有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同的地方”。同样，那种把孙中山“孔子化”和传统道德文化复活的命辞，同样抹煞了孙中山“思想体系之伟大与卓绝”。总之，把三民主义“马克思化、释迦化、本土化、流氓化”“是无可容恕的错误！”^①由此可见，他不仅反对新三民主义，而且激烈地抨击蒋介石、戴季陶的所谓“三民主义”。

在抗战的问题上，胡汉民从主张对日直接交涉很快地转变为主张武装抗日。他提出对十九路军淞沪抗战要“切实应援”，“真实谋长期确实之抵抗”。他驳斥了“抗日亡国论”，阐扬了民族主义。他承认中日两国“强弱异势，优势悬殊”，但他认为中国在扫除了不抵抗主义力量以后，抵抗力量“不可侮”。^②他预言国民政府对人民民族主义精神的压抑是徒劳的，而“民族斗争之壮烈的一幕，期在不远”。^③

他反对依赖国联和英美解决东北问题。他说国联“只是世界弱小民族的屠场”，不会有“正义”、“公道”，即使“能做几件比较满意的决议”，也顶多只是做些纸上工作，于日本入侵“绝无影响”。

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细亚主义”的侵华理论。认为“大亚细亚主义”必须基于民族主义，否则“决不是孙

^① 胡汉民：《三民主义的心物观》，《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1933年4月15日。

^② 胡汉民：《从日本现势说到对日抗战》，《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4期，1933年4月15日。

^③ 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三民主义月刊》第7卷第4期，1936年3月第14页。